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编
山西省考古学会

鹿鸣集

李济先生发掘西阴遗址八十周年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五十周年

纪念文集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鹿鳴堂

鹿鳴堂

鹿鳴堂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编
山西省考古学会

鹿 鸣 集

——李济先生发掘西阴遗址八十周年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五十周年
纪念文集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2006年10月中旬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西阴遗址发掘八十周年”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建站五十周年”会议的纪念文集，共收录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提交的学术文章50余篇，谈西阴、论文明，忆侯马、说晋国，集中了近年来山西史前考古和商周考古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领域的研究者及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鹿鸣集：李济先生发掘西阴遗址八十周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学会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3-026262-2

I. 鹿… II. ①山…②山… III. 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报告—夏县—纪念文集 IV. K872.2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5177号

责任编辑：闫向东 雷 英 / 责任校对：郑金红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张 放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年12月第一版 开本：889×1194 1/16

200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9 1/4 插页：6

印数：1—1 500 字数：815 000

定价：18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编委会名单

主编：宋建忠 谢尧亭

编委：宋建忠 张庆捷 海金乐 马 昇

谢尧亭 薛新明 吉琨璋 范文谦

王晓毅 郑 媛

前 言

宋建忠

2006年10月中旬，对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而言，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时光。在那个金秋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最尊贵的新朋老友，一起庆祝中国考古史上的两个重要事件：一个是纪念西阴遗址发掘八十周年，另一个是纪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建站五十周年。

1926年2月，为了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时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的李济和中国地质调查所袁复礼到山西晋南进行考察。2月22日，他们途经夏县西阴村时意外发现了西阴遗址，并于当年10月15日至12月初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于是，这次发掘成为“国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次”，李济和西阴从此载入史册，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光阴似箭，80年后的10月15日上午，我们站在前辈发掘过的土地上，凭吊西阴，缅怀先驱，展望中国考古学的明天，意义非凡。考古学家黄景略、张忠培、严文明、王克林，李济先生之子李光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以及40余位国内外知名中青年学者，参加了在西阴遗址举办的“西阴遗址发掘八十周年纪念碑”揭幕仪式，以及之后以中华文明起源、纪念李济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此外，李光谟先生还特意为会议赠送了《李济文集》，仿佛使我们聆听到这位中国考古学奠基人的谆谆教诲。

1956年10月，为了使侯马晋国遗址的考古工作长期有效地开展下去，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设立侯马工作站。由此，侯马工作站成为全国最早的考古机构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和关怀下，侯马工作站对晋国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前后约有200余位国内外考古工作者参加了发掘工作，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考古的中流砥柱，其中包括苏秉琦、张颢等著名的老一辈考古学家。

岁月如歌，50年后的10月10日，当年意气风发、激扬文字的热血青年，一个个再次回到他们“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地方，只是无法掩饰时光的流痕，均已“朝如青丝暮成雪”。然而，从他们脸上，仍然可以看出兴奋和喜悦之情，毕竟在这里，他们度过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是黄景略、谢辰生、张彦煌、高炜、陈文华、彭适凡、杨育彬等。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李伯谦、刘绪、张天恩等省内外学者共计100余人。

用两个会议来纪念两个重要事件，其目的是温故知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我们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汲取养料，为我们山西的考古事业出谋划策，共筹美好蓝图。两个会议共收到论文70余篇，这些文章洋洋洒洒，谈西阴、论文明，忆侯马、说晋国。我们从中选出了近60篇集结成册，以飨读者，永志留存。

《诗经·小雅·鹿鸣》是一首宴饮宾客之歌，主人盛情邀请德才兼备之嘉宾欢聚一堂，学习他们的高尚品德，恳请他们指点迷津。歌中之美酒、佳肴、鹿鸣、琴瑟，其乐融融，其情切切。这不就是我们两个庆典和会议的真实写照吗？因此，我们将嘉宾之文集名为《鹿鸣集》，我想再贴切不过了！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怵，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感谢所有参加两会的领导、嘉宾和朋友！

目 录

上编 纪念西阴遗址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前言	宋建忠 (i)
“纪念西阴遗址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宁立新 (3)
“纪念西阴遗址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严文明 (5)
“纪念西阴遗址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张忠培 (8)
前仰韶文化时期的三足器	李浪林 (10)
后冈、西阴与红山——公元前 5000 ~ 前 3000 年中国北方的态势和文明的崛起	乔 梁 (13)
彩陶“西阴纹”细说	王仁湘 (20)
史前晋南和北方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宋建忠 (35)
山西垣曲盆地的聚落形态与社会变迁	戴向明 (44)
垣曲盆地仰韶晚期遗存的两个问题	许永杰 (74)
垣曲盆地新石器时期陶器化学成分初探	王晓毅 王小娟 (91)
近 20 年来仰韶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赵春青 (99)
人面形筒状器物的宗教含义——兼谈和红山文化筒形器的关系	王京燕 (105)
从聚落形态看人类族群的演进	钱耀鹏 (108)
山西新绛县孝陵遗址陶窑群发掘初识	王金平 杨及耘 (119)
山西发现“土鼓”初论	王 俊 马 昇 (122)
陶寺文化长度基元初探	何 弩 (142)
陶寺文化与铜铃	宫本一夫 (156)
从考古材料看陶寺远古社会的阶级差别	郭智勇 (160)
石器分析与文明起源研究的几点浅识	石忠 丁金龙 (167)
环盐湖地带新石器文化初论	王月前 (171)
山西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甘 翌 (179)
西阴村遗址研究八十年	田建文 (182)
半个蚕茧 两岸风波——考古学大师李济与夏鼐的故事	陈代俊 (190)

下编 纪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建站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纪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建站五十周年”开幕式上的讲话	高 可 (205)
晋南“夏墟”考	张国硕 (207)
商代的“方”方——晋地诸戎来源之一的甲骨学考察	罗 琨 (215)

棚国考	张永山 (228)
西周初年汾河下游霍、杨封国考——封国考之一	陶正刚 (237)
西周金文中的王称	刘雨 (243)
帷帐形棺饰溯源	高炜 王岩 (254)
台湾所见晋侯斨簋	李先登 (261)
楚公逆编钟的成编方式及其他	李朝远 (263)
晋侯墓地玉器的工艺	张奎 (269)
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出土的玉石器	张素琳 (276)
青铜钲浅论	马今洪 (284)
作为考古学的周文化	王力之 (293)
侯马盟书“内室”商榷	赵世刚 (296)
太原晋国赵卿墓车马坑及相关问题——试说较、轼、轂	魏成敏 (299)
浑源牺尊铸造技术考察及相关技术的讨论	廉海萍 (305)
“九原”的地望及其相关问题	谢尧亭 (319)
读《国语·晋语》二得	田建文 (330)
释“宗主”“宗盟”——兼论《侯马盟书》所反映的春秋末年社会结构的演变	赵瑞民 郎保利 (335)
晋假虞灭虢后的上阳城	宁景通 (342)
从异地出土的有铭吴越青铜器看晋与吴越的文化交流——兼谈春秋时期晋国和越国 在争霸斗争中的策略	劳伯敏 (348)
河南晋文化钩沉	杨育彬 (357)
从分水岭 M12、M25 看晋东南地区的积石积炭墓	杨林中 (364)
新田祭祀遗迹研究	吉琨璋 (371)
侯马西高祭祀遗址出土龙形玉佩特征及年代分析	马金花 (382)
“塗水”方足布	张崇宁 (390)
介绍一件晋阳令铜戈	黄锡全 (392)
试论周代棺槨构筑程序及相关葬仪	高崇文 (395)
从乔村殉人墓的文化归属看战国时代的奴隶制	梁云 (403)
山西省境内出土的带钩	张红旗 (417)
古代棺钉略论	祁小东 (439)
平朔出土几面精品战汉铜镜	冯国梁 (446)
永乐宫重阳殿扇面墙“小《朝元图》”内容考辨	李杰 薛奎 (450)
从侯马“新田”等四处古遗址发掘的丰硕成果看文物普查与保护工作的历史价值	张德光 (453)
风云半百 往事悠悠——记侯马工作站初建二三事	张守中 (459)

**上编 纪念西阴遗址发掘八十周年
学术研讨会论文**

“纪念西阴遗址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

宁立新*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纪念李济先生发掘西阴遗址 80 周年，首先我代表山西省文物局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地祝贺！对各位专家、学者和朋友们的到来表示热烈地欢迎。

80 年前的今天，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在这里铲下了第一锹土，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的科学田野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这一天起，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奠基；1927 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出版了李济先生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一书，先生的报告突破了以往研究古物的金石学传统，开创了中国人自己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考古学的新路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济先生完全可以被称作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李济先生是第一位荣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和“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荣誉会员”的中国人；先生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先生主持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信史向前推移了几百年；先生在极其艰难的战争年代，领导考古工作者对全国 14 省的 400 多处、自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取得了辉煌成果；先生为近现代中国培养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考古界的中坚力量，被公认为是考古学界的“伯乐”；先生生平有关考古学的著述达 150 种之多，可谓著作等身，他主编的考古学专集、报告集、期刊，都是具有很高水平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必读之作；先生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考古事业。

先生不仅是学术巨匠，同时也充满了人格魅力。

当年发掘西阴村时，先生向资助发掘的美国弗里尔艺术馆的毕士得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另一个是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张光直先生在评价这件事情时说“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作出任何的让步。这种眼光远大的爱国精神是李济先生一生从事学问，从事事业的特色。西阴村的实践为中国考古学的对外合作树立了榜样。

1929 年，先生在领导殷墟第二次发掘工作时，就与参加发掘工作的同仁约定：一切出土文物全部属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仁自己绝不许收藏古物。到他去世后清点遗物时，只有台北“故宫博物

* 宁立新，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

院”赠予他的几件仿古工艺品。身为一代考古学宗师，终其一生，未曾收藏过一件古董，2.2万本藏书，却无一珍本善本。先生信守了自己的约定，而且这一约定后来逐渐成为中国考古界、民族学界的传统。

也许考古学家的秉性正如他们所要发掘的地下文物，埋藏多年无人知晓。只能靠后辈考古人对考古学家的事迹进行发掘整理，将他们零碎如陶片般的事迹一一拼对。但拼对出来的结果却常常让人沉思许久，回味不已。

我们今天在这里追忆先贤，意图在于启迪后人，希望能够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希望山西的文物事业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祝与会学者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纪念西阴遗址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

严文明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纪念西阴村遗址发掘 80 周年，是很有意义的。80 年的时间不短，几乎代表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整个历程。今天中国考古学的状况同 80 年以前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认为西阴村的考古对于今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具有方向性的奠基作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下面我想讲两个问题。

一、关于西阴村遗址发掘的历史意义

一，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西阴村遗址是 1926 年发掘的，在此之前的仰韶村遗址发掘虽然也是中国的学术机构地质调查所进行的，但主持者是当时政府聘请的外籍专家，中国学者只做了些辅助的工作。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则完全由中国学者李济主持，袁复礼等参加。从此中国考古学才逐渐走上了自己发展的道路。

二，第一次有计划地用探方法进行考古发掘，并且详细地记录了地层的变化。仰韶村的发掘是试探性的，东挖一坑，西挖一沟，只有第 12 地点的墓地挖的稍微大些。地层只有深度记录，没有文化层变化的记录，更没有一张像样的地层剖面图。西阴村虽然也是按水平深度发掘的，但是注意了土质土色的变化，并且有清晰的地层剖面图，在图上可以看到不同层次土质土色的变化。这是很不容易的，至今西方仍然有不少考古学者采用这种方法。

三，第一次按照三维坐标记录和采集小件遗物，按照层位采集陶片，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科学基础。直到现在，我们绝大部分工地仍然采用这种记录和采集遗物的方法。

四，西阴村的发掘是 1926 年 12 月结束的，1927 年 8 月就及时地发表了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向学术界通报发掘成果。这一点我们现在还往往做不到。

五，报告中谈到西阴村的彩陶时，认为应与共存的其他陶器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不要单独抽出来谈它的来源，第一次对彩陶西来说提出质疑。

六，发掘结束后及时让梁思永整理陶片。梁思永是第一次对第四探方的全部陶片进行形态分类统计和描述的学者，是探索如何进行类型学研究的先驱。

七，历史的际遇往往有想不到的巧合。两位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奠基人在这里初试身手，就获得了不同凡响的成果，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了。

八，西阴村的考古发掘当然也有局限，主要是地层关系并没有真正弄清楚。报告中虽然注意到坑穴一类的遗迹现象，并且讨论是否是居穴的可能性，从袁复礼测绘的发掘后的地形图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几个灰坑的遗迹，但发掘中却没有单独编号，没有把灰坑中的堆积作为单独的地层单位对

待，更没有注意到是否有遗迹与地层或遗迹与遗迹之间的打破关系（例如位于第2、3、5、6探方之交深2.59米的灰坑与它南边那个最大的灰坑就可能有打破关系）。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分期研究的准确性。这在早期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是难以避免的。这个问题直到后来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时才逐渐解决。

二、关于西阴村文化遗存的性质及相关问题

西阴村遗址的文化遗存比仰韶村单纯得多。按照现在的认识，它只有仰韶文化的遗存，而且主要是庙底沟类型的遗存，根本没有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等到1994年秋第二次发掘时才发现有庙底沟二期和更晚的遗存）。仰韶村遗址则从仰韶文化早期直到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都有。如果西阴村的发掘在仰韶村发掘之前进行，很可能就叫西阴文化而没有仰韶文化的名称，在20世纪30年代探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时也不至于弄得那么复杂。事实是那时主要强调了安阳后冈等地龙山文化叠压仰韶文化的地层关系，同时关注两个文化的分布状况，在这个基础上做文章，没有充分利用西阴村的资料。如果利用西阴村和不召寨比较单纯的资料去甄别仰韶村的资料，不但可以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应该叫中原龙山文化）清楚地区别开来，也会进一步看到西阴与后冈的区别。所谓混合文化的概念也不会提出来。但历史不能假设。学术研究总是走着曲折的道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由于西安半坡、陕县庙底沟、华县元君庙和泉护村以及洛阳王湾等遗址的发掘，对于仰韶文化以及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的认识逐渐深化。1962年杨建芳首次全面提出仰韶文化的类型和分期，1965年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更把仰韶文化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考虑到一些典型遗址的资料发表得不够理想，进而影响到研究的深入。我花了比较多的精力对典型遗址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各个自然区的仰韶文化遗存进行比较细致的分期研究，进而对整个文化进行分期和划分类型的研究。最后探讨整个文化发生、发展与走向衰亡的过程与内部机制，探讨周围文化在仰韶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力求从发展演变和相互关系上辩证地处理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避免了静态的研究方法，也避免了外因论和孤立发展论。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仰韶文化的遗存发现得越来越多，仰韶文化的内涵显得非常复杂，一些学者提出将其中的某些文化期或文化类型独立为考古学文化的意见，但究竟如何划分，划分出的文化又如何命名，各人的意见并不一致。一些学者仍然坚持仰韶文化的概念，只是在仰韶文化下面划分出不同的文化期和文化类型，对整个仰韶文化的时空范围也有多少不同的认识。有不同意见是很自然的，学术研究往往是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前进的方向的。我赞成保留仰韶文化的名称，也不反对在仰韶文化之下再划分为若干文化。按照柴尔德和夏鼐提出的划分考古学文化的原则，再小的范围也可以称为考古学文化。只是我们要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层次分析，有大文化，有小文化或者说亚文化，不能一锅煮。仰韶文化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第一个被发现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当时认为它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是以彩陶为特征的，并且很可能是汉民族祖先的文化；现在看来这些看法还基本上是正确的。仰韶文化是一个大文化。马家窑文化过去曾经被称为甘肃仰韶文化，其地位即相当于仰韶文化之下的亚文化。后来改称为马家窑文化，或再分为马家窑文化和半山—马厂文化，实质上也只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特化了的地方类型，或者说是一个亚文化，不能与仰韶文化平起平坐。同样在内蒙古发现的海生不浪文化也是仰韶文化晚期特化了的地方类型，也是一个亚文化。以此类推还可以划出一些亚文化。

仰韶文化能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自身特征的考古学文化而存在，要看它是不是具有基本的

共同特征以区别于其前后和周邻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最富特征的陶器是小口尖底瓶，它是仰韶文化各个时期和各个地方类型的主要器物之一，别的文化是没有的。仰韶文化基本的器物组合是瓶、钵、盆、罐、瓮，它形成于仰韶文化早期即半坡期，也是其他各期最主要的器物。这既区别于以前的白家文化（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和以后的中原龙山文化，也区别于大致同时而相邻的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和大溪文化。仰韶文化是以彩陶著称的，这很明显区别于比它更早和更晚的文化。但具有彩陶的文化不止一个，仰韶文化的彩陶有什么特点呢？仰韶文化的彩陶非常复杂，要归纳出共同的特点是很难的。但只要与周围的文化相比，还是可以看出某些规律性的差别。仰韶文化的彩陶主要是在红陶地上画黑彩，早期多以直线和直边块体构图，中期多以曲线和曲边块体构图，晚期多以直线和曲线构图，这一演变规律不同于红山文化，也不同于大汶口文化和大溪文化。仰韶文化的鱼、鸟、蛙、鹿等动物花纹也不见于其他文化。仰韶文化是一个强势文化，它对周围文化有明显的影响，同时也接受周围文化的某些影响，因而有某些彩陶花纹相同或相似是不奇怪的，但毕竟各有特点。从这些方面来看，仰韶文化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仰韶文化的研究涉及许多方面，不只是文化特征、分布范围、文化分期、地方类型、具体年代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也不只是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具体过程以及引发这种变化的内部机制和外部原因等问题，还有这个文化的经济诸如农业、养畜业、采集、捕鱼、狩猎等生业经济，还有建筑业和石器、陶器、骨角蚌器等的制造业以及纺织、编织等手工业生产经济，还有为实现这些生产的技术，产品的分配与交换等，其中有一些有专门的研究但不深入，有一些还没有进行研究。至于当时的家庭形态、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性质、风俗习惯以及艺术、宗教等精神文化的研究也是如此。其中有些关键性问题，我在纪念仰韶文化 65 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意见。20 年过去了，似乎没有太大的进展，我也没有太多新的想法，就不耽搁大家的时间了。

“纪念西阴遗址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闭幕式上的讲话

张忠培

山西这个地方表里山河，可以分几个地区：

一个是晋西南，也就是涑水河流域为中心的运城盆地；一个是晋东南；一个是晋南，也就是汾水下游为中心的临汾盆地；一个是晋中，吉林大学 20 世纪 80 年代在晋中的太谷白燕、汾阳杏花村、柳林高红等地都做过工作，还进行过晋中调查，我也参加了，比较熟悉；一个是晋东北；最后一个是晋西北。这种分区表面上看是地理分区，如果从考古学的角度去把握，这五六个地区相互肯定有联系，但这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代发展而有所不同。我想，是不是思考和找出其差别之后，再考虑其相互联系和联系的内在原因。现在就我所想到的，讲三点，供大家参考。

一，就我个人的看法，山西每个区都很重要，但临汾地区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汾水流域，是如何沟通了陕北的新华等遗址再往北发展的？目前还搞不清楚，在座的诸位有兴趣可以注意一下。

陶寺的分期，说法纷纭，发表材料零散，今天说是夏，明天说是庙底沟二期，后天说尧，希望该遗址发表全部材料，系统研究一下。也希望国家文物局有所干涉，前面发掘的材料没有公布之前，不要批准再继续发掘了。那可是国保单位啊！欠账太多，影响研究。墓地属于哪一期，城址属于哪一期？如何互相对照？没有发表可资对比的基本材料，这怎么能行呢？

山西各地区，不同阶段的发展有不同的意义，如仰韶晚期和殷墟时期，对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形成都起着很大的作用。鉴于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

二，关于队伍建设问题。1992 年到 1995 年，杨富斗先生当所长的那个时期，山西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下同）完成了老新交替的工作，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杨先生站得高、看得远，注意抓报告，几年的时间里，山西就出了几本质量比较高的大报告，用报告带动了人才队伍的建设。新人的介入是一个单位往前发展的基础。现在这批骨干均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 90 年代初到山西所工作的，力量放到全国比，都很强，而且课题意识和创新意识也很强。

杨先生班底就是培养和留下了一批龙。群龙要有首，庙里菩萨多了香火才盛，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情。这批人个个都是人才，但我还要说，人才要注意形成梯队、接力棒，才能将好的传统代代继承下去。要注意抓学术道德，山西很少写花里胡哨的文章，搞炒作的学者说到底就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学者。好的学风很重要，也很难得。山西的学术水平放在全国比也不差，学术报告中不少是水平很高的，最近新出的几本集子和简报也都不错。

所以，现在的山西，学术水平是史无前例的；横向比较，在文物局系统是比较靠前的。山西要保持啊！

三，希望山西的文物考古工作纳入到文物保护系统中来。关于文物考古工作，就山西来说，地上文物很多也在全国很靠前，地下的也多但还没有跟上。希望山西能够出现河南的安全槐、广东的